

# 1 古越珠光

记述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有必要了解以下场景：

先秦三代时期，君主们经常举行与诸侯的朝会。朝会的仪式很隆重，要筑坛建台，君主们正冠整衣危坐坛上，各位辅臣肃立两旁，各路诸侯则带着各地最珍贵的土特产在台下等候君主的传诏进贡。《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的周成王朝会诸侯的场景非常浩大，各种土特产贡品堆积如山，摆放数里。这种朝会的一个目的就是君主们要了解各地诸侯的特产，掌握天下财富。同时也能为后世留下物产方面的记录，从中了解各地诸侯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以及各个诸侯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风物。

如《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述：“其西鱼复，鼓钟钟牛。蛮扬之翟，仓吾翡翠。翡翠者，所取羽。其余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众皆北向。”在这段记述中，台下靠着两边的贡品是鱼复进贡的鼓、钟以及铜制的牛。扬州（扬越）一带进贡品是一种叫做“翟”的鸟。仓吾一带进贡的是翡翠鸟以及用翡翠鸟毛制成的工艺品，其余的贡品中，其用途都知道了。南方一带进贡有大象。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他们都是向北方君主进贡。

《商书·伊尹献辞》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伊尹朝，献商书，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在，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沔深、十蛮、越沔，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稗，乌鲔之酱，蛟鼈利剑为献。正南瓠、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已、

阙耳贯胸、雕题、离卿、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纁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戴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驹騃、馱馱、良弓为献。”

汤曰：“善。”

把《商书·伊尹献辞》中的这段记录译成白话就是：

商汤对伊尹说：“诸侯来进贡，有的没有土产而贡献远方的物品，事与实相反，不方便。现今我想依据土地所出作贡物，一定要容易到手又不珍贵。你就制定四方进献的法令吧！”

伊尹接受命令，于是就作《四方令》道：“我要求正东的符娄、仇州、伊虑、洳深、九夷、十蛮、越洳及断发文身的部族，要命令他们以鱼皮制的刀鞘、乌贼鱼酱、鲨鱼皮制的盾牌、利剑作为贡物；正南方的瓠骆、邓国、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国，要命令他们以珍珠、玳瑁、象牙、犀牛角、翠鸟羽毛、茵地的鹤、矮脚狗作为贡物；正西方的昆仑、犬戎、鬼方、枳已、阙耳、贯胸、刺额、离身、黑齿的方国，我命令他们以朱砂、白旄牛尾、毛毡、江历、龙角、神龟为贡品。正北方的崆峒、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狄、匈奴、楼烦、月氏、戴犁、其龙、东胡等方国，要命令他们用骆驼、白玉、野马、驹騃、馱馱、良弓作为贡物。”

汤道：“好。”

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大会诸侯是在周成王二十五年，即公元前1002年。

《商书·伊尹献辞》中记载的“作四方令”，时间约在公元前17世纪

初。因为伊尹是商朝的第一任大臣，曾助商汤攻下夏朝，建立商朝，是一个有功重臣。他还是汤、卜西、仲壬三朝重臣，是商朝的栋梁之臣。《商书·伊尹献辞》中这段记录是伊尹秉承商汤的旨意向天下发布诏会（四方令），征集各地的贡品。

《逸周书·王会解》、《商书·伊尹献辞》中所提到的蛮扬、仓吾、九夷、十蛮等地名，就是包括古合浦郡在内的百越族群聚居地，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江浙闽桂粤琼及西南地区。秦始皇略取岭南所设的南海、桂林、象郡、也都属于百越族群聚居地。根据《壮族通史》研究考证，《商书·伊尹献辞》中，伊尹说的“沔深”、“越沔”（即“瓯越”）以及正南诸古国，均为越人地名或分支族名，同壮族先民及壮侗语族诸民族先民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桂国”，古国地名，因产桂树而得名。故知“桂国”为壮族先民岭南越人地。

“损子”，古国地名，亦称“啖人国”，也在今广西、广东一带。《墨子·节葬篇》云：“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因民间有“食老”、“食长子”的神话传说而得名。《后汉书·南蛮传》谓：“今乌浒人是也。”今壮族、布依族民间还流传“食老”的神话传说。证明“损子”国，亦属壮族先民分布区域。

“陆梁”，古侯国，为岭南越人的一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云：（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

“陆梁，诏以为列侯，自置吏，受令长沙王。”其名称可能是译写于古越语称“山谷”、“山后”为“陆梁”的缘故。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发现有“陆梁尉印”一件文物，证明“陆梁”为岭南越人的一支，因其

地在百越之北境，故秦始皇南并百越，必先取“陆梁”，进而南并百越，置桂林、象郡、南海。

“产里”，徐松石在《泰族僮族粤族考》中说：“产里，国都于临尘，今广西邕宁县西，后迁居云南车里（今西双版纳），车里、撒里为产里之谐音。其国人为傣族先民，亦为越人的一支，壮傣古代同源，西迁者为傣，留居当地者为壮，二者关系密切。”

“百濮”，亦称“濮”、“濮人”、“卜人”。我国南方古族名，分布在江汉之南，或楚国西南。最早见于《尚书·牧誓》，为商周之际参加周武王“伐纣”会盟的八个少数民族之一。周匡王二年（前611年），与糜人伐楚。周景王二十二年（前523年），楚为舟师以伐濮。隋唐之后，滇西南亦有濮人（元以后称“蒲”）活动之记载。“百濮”即“百越”，为壮侗诸民族先民。

“越沔”，即“越瓯”，亦作“瓯越”，以“剪发文身”为特征，包括以后的东越、西越、东瓯、西瓯诸部。《逸周书》所载的“越沔”，指东部越人即句吴、于越、东瓯诸部。其文化特征与西南、西瓯、瓯骆诸部相同，与壮族先民有密切关系。

《逸周书·王会解》还载有：“路人大竹，仓吾翡翠。”

“路人”，王云五在《逸周书集训校释》（丛书集成初编本）中谓：“路音骆，疑即骆越。”如此说成立，则“骆越”早在商周之际，已著名于南方，向商朝进贡大竹。战国时的著作《周礼》卷三十八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其中的当为貉越人。骆越之骆，也可写为貉雒。

“仓吾”，亦作“苍梧”，金文已见其名，或因族而名地，或因地而名

族，位于西江下游今广东省肇庆、德庆、怀集、连山、连南、连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昭平、平乐、富川、钟山、贺州及湖南省江永、江华等地。宋人罗泌《路史》谓“仓吾”为古国，注谓自广东至湘潭。近人徐松石在《泰族僮族粤族考》中谓“仓吾”蛮为“僮古佬”、“牂牁僚”的谐音，乃是“僮族”的一种自称。以上两说虽未取得有力的佐证，然其为壮族先民岭南越人的一支是可信的。余谓“仓吾”的“吾”字与“瓯”、“乌”字同音，与以后“西瓯”、“乌浒”人的居地也一致，当是仓吾→西瓯→乌浒的字面演变罢了，是越人中稻（蒿）图腾的一支，当然是壮族和壮侗语族诸民族的直系先民。

在先秦古籍和中原地区出土的西周东周青铜器铭文中，常见的有“南夷”、“南蛮”、“南瓯”、“南海”、“南国”、“交趾”等古地名或古族名，多泛指岭南少数民族或其他地区，虽非专指某个民族，亦同壮族先民岭南越人有密切关系。

秦置岭南三郡，只设一个岭南都尉领治，赵佗因此有了可乘之机，趁秦末天下大乱之机，起兵并击三郡（合浦地处于南海与象郡之间）建立南越王国，奉行“越汉和亲”，聚集百越的政策，推动了百越地区的农业生产、商贸交流和文化发展，并在合浦留有“糠头山”和南越王行宫。赵佗去世后，政权落在宰相吕嘉手中，因与汉武帝对抗招致亡国之祸。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将岭南三郡改设合浦等九郡，合浦因此有了独立的行政区域设置。也就是说，合浦地域上从此有了由中央政府设置的独立行政机构，这个行政机构就是“合浦郡”。

在地方史料记述中，关于“合浦”由来的提法颇多。

“合浦”源起何时何地？按通常的说法是：汉元鼎六年，汉武帝平定岭南，将原南越王国盘踞的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地区分设为九郡：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因此得名。

汉武帝为什么要冠“合浦”作郡之名？《合浦县志》、《合浦县地名志》等书的注释是：“合浦，意为河汇集于海的地方。”但，合浦得名缘由不仅限如此。这里，首先要考证合浦在汉元鼎六年也即是公元前111年以前的古属地位。

《汉书·地理志》中记述：“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这里的“粤”与“越”在古代通假使用。“越”就是族群的称呼，即越族。越族泛指古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的居住族群。合浦地区在秦汉以前是越族居住的地方。《吕氏春秋》中也有记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敞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头之国、多无君。”早在春秋战国以前，“百越之际”就有缚娄、阳禺、欢头这类的部落，这些部落都没有建立国家行政机构，处于无政府状态，直至秦始皇“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之后（《贾谊·过秦论》），才建立了国家机器，此时合浦属象郡。

合浦古属“百越”，但百越中支系庞杂，正如《汉书·地理志》所称：“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合浦又属于哪一个“种姓”呢？贾谊的《过秦论》引述：“百越非一种，若今言之百蛮也。”循此线索查找，《后汉书·南蛮传》中说：“南蛮，今乌浒人是也。”这是说，百蛮中的南蛮，即是汉朝时的乌浒人。再循此线索查找得知，“交广之界民日乌浒”（《太平御览》）。交、即交州；广，即广州。“交广之界”，根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中的记

述：“权（孙权）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合浦以北为广州包括合浦在内。这里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孙权将交州划分交广两州前，合浦原属交州，将合浦以北划为广州后，合浦属广州。二是自此以后，合浦成为交广两州的分界地区也即是乌浒居住的“交广之界”。

明确了秦汉以前的合浦古属地位之后，再来探析乌浒族的社会形态。据《壮族通史》考证，乌浒族是百越族群中最强大的支系，秦始皇南取百越，汉武平定岭南都遭到乌浒人的强烈反抗，使得泰、汉王朝几十万大军“三年不解甲驰弩”。《后汉书》中也屡有合浦乌浒“反叛”的记载。乌浒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壮族通史》的考证是，乌浒居住地相同，语言相同，都说壮语。《越史丛考》也考证了西瓯包括汉代的苍梧、郁林、合浦三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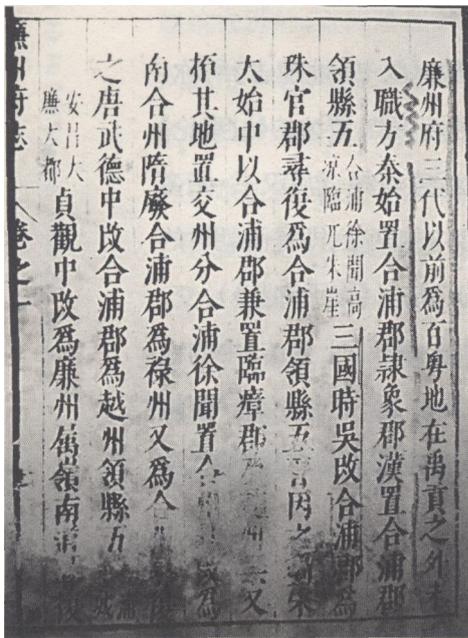


图 1-1 明崇祯年间本《廉州府志》中关于秦设合浦郡的记述。

明确了乌浒人是壮族直系先民之后，合浦在壮语中的称呼也就容易考证了。在壮语发音中，“瓯”与“乌浒”是同音异字。在书写方面，“乌浒”

又写作“乌浦”，乌浦又书作“合浦”（《壮语通史》）。乌浒人在春秋战国末期已颇实力，屡见诸当时史籍，合浦在战国末期就以“乌浒”这一壮族读音及书写形式存在。到了汉元鼎六年设立中央管辖的地方行政区时，由壮语的“乌浒”读音，音译成“合浦”汉语读音，并以汉字“合浦”代替壮语中的“乌浒”为郡名。

查证了合浦古属称谓变化之后，合浦的古属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那么包括合浦在内的百越地区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状态？3700多年前的商朝开国皇帝汤和他的大臣伊尹又是怎样把纳贡的眼光投向万里之遥的合浦？

先来明确一下“百越”的指称。

百越是我国古代东南部民族名。战国秦汉时期，越人分布地区很广。《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因这一地区为《禹贡》扬州之域，故对越人称“扬越”；因其“各有种姓”，各部杂居共处，互不统属，故又称为“百越”。“百越”，按当时的称谓举其著者，有东越（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雒越等。

百越各部分布虽广却具有共同的民族特征，他们的族名是共同的。从战国到两汉这一时期中，百越部落有三个共同的族名称谓，即“越”、“骆”、“瓯”。“瓯”和“骆”是本族的自称，“越”是华夏给的名称。他们有共同的居住区域。《汉书·地理志》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中国古代东南沿海以至五岭以南和瓯江、闽江流域，都是百越分布地区。他们还有本民族的语言，即所谓“越语”。刘向《说

苑》记有一段故事，说楚国有个王子泛舟于清波之中，听划桨的越族姑娘唱了一支歌。楚王子“召越译”翻译才懂得歌词的意义。可见越语不仅不同于中原华夏语言，也不同于邻近楚人的语言。他们的经济生产相同，各部落都以种稻田为主，兼营渔猎或、狩猎。《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在战国时，于越冶铸的青铜剑就很有名，其锋利能“穿铜釜”。岭南地区的越人，则表现为铜鼓的制作。传世的大量铜鼓，其铸造之精，雕镂之美，图案之丰富，均世所罕见。



图 1-2

位于合浦县城的汉窑遗址发掘现场新发现的汉代水井群，是合浦古代陶瓷业发展及社会生产状况的见证。

越人有共同的习俗。建筑住宅，用柱搭架为楼阁，人居楼上，牲畜家禽则自养在楼下，这种住宅称为“干栏”。晋张华《博物志》称：“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如断发文身，《史记·赵世家》说：“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越人性习于水，善于水上活动，《越绝书》卷八称：越“水行

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王刘安在上武帝书中也说，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

大体自今湖南省的东部与南部，以东以南都至海，包括江西省、浙江省、苏南、皖南、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至越南北部所分布的众多部落与民族，是族类相近的一个大族系，通称为百越。从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及岭南都存在自有渊源的新石器文化区域看，百越应是起源于中国的东南与南部的土著。至青铜时代，有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青铜文化，是古代百越的物质文化遗存。这种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可追溯到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而形成的年代至少可追溯到中原的商代。其分布较广，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香港等省区均普遍发现；在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与南部、广西南部及东部及东北部、台湾的部分地区也有发现。在云贵高原，目前尚未发现几何印纹陶并存的有段石铤和有肩石斧，于云南滇池周围及其他地区和贵州的一些地区都有发现，是越人分布到云南的证据。这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兼有渔猎的水田农耕文化，有通常认为是越人文化遗存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器物有鬲，有鼎。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中国的炊器可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系统。鼎为东南特征，鬲为西北特征。在太湖地区的青铜文化中，至今未发现鬲，而熟湖文化却出现了大量的鬲和甗，这是来自西北的炊器，但熟湖文化把鼎的角状把手移植到鬲上，成为一种当地特有的器物。熟湖文化的分布以南京为中心延伸到江苏、安徽两省长江沿岸，往往称之为先吴文化。吴太伯兄弟南奔到越人地区，吴善于向中原学习，善于吸收。作为越人中先进之区的勾吴与吴文化分布之区，东至海，在太湖东南与于越错居；南达新安江上游

南岸；西临彭蠡与楚相接；北以大江为界，与南淮夷隔江相望。地域大致相当于今苏南。皖南和浙江北部一部分地区。

越族分布于不同地区而有不同的名称：

于越——主要分布于今浙江，春秋时建立越国，都于会稽（今绍兴），后被楚国所灭，其族人或融合于荆楚，或散处于海滨。

东瓯——或称瓯越，主要分布于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西汉惠帝三年封首领摇为东瓯王，都于东瓯（今温州），后闽越攻打东瓯，东瓯请汉援救，闽越退兵，汉徙东瓯人于江淮之间。

闽越——主要分布于今福建闽江流域。西汉刘邦封其首领无诸为闽越王，都于东冶（今福州）。

南越——主要分布于今广东、广西。秦汉之际，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帝，并以兵威财物役属闽越、西瓯、骆越等，称雄一时。汉武帝时平定南越，南越建国共历五世93年。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第二代南越王墓，出土一枚铭刻“文帝行玺”的龙钮金印及1000多件文物。

西瓯——主要分布于桂江、浔江流域，以今广西贵港县为中心。其地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郡治在布山。1976年在贵县罗泊湾发现一座西汉初期的大型木椁墓，出土漆器有“布山”铭文。

骆越——主要分布于广西左、右江流域、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至越南东北部。骆越以农耕为主，有“骆田”，部落首领称“骆侯”、“骆将”。

越族有许多支系，故称“百越”，他们有共同的文化特征：

（一）创造了印纹陶文化。这种文化以陶器表面拍印几何形花纹为主要特征，较早的陶器质软，叫“几何印纹软陶”；较晚的陶器质硬，叫“几

何印纹硬陶”。

(二) 使用的石器主要是有段石铤和双肩石器。

(三) 青铜铸造发达，普遍使用铜鼓，善于铸造青铜宝剑。春秋时代，“干（吴）越之剑”和欧冶子的铸剑技术，著名全国。以往的铜器著录中，收录了不少吴越铜剑。解放后经科学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吴越铜剑也不少，如“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句剑”等，这些剑都保存完好，刃薄而锋利。

(四) 经济生活以种植水稻为主，兼从事渔捞。

(五) “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的特点是底部悬空，正脊的两头翘起，屋顶结构作两面坡式。建筑“干栏式”房屋的目的在于防卫毒蛇瘴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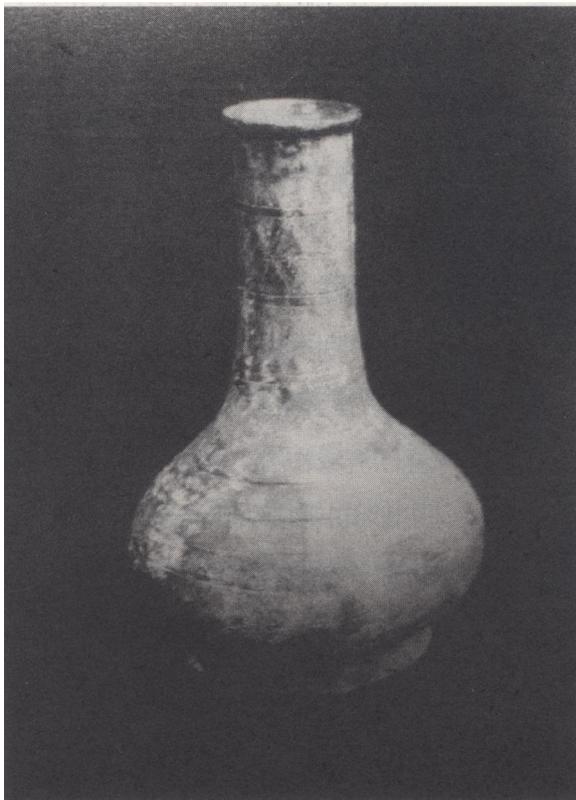


图 1-3

合浦汉墓出土的青铜器，见证了合浦汉代青铜冶炼技术及社会生产发展状况。

(六) 流行断发文身和拔齿习俗。越人断发文身，屡见于记载。1982年在广州瑶台柳园岗发掘了一处西汉墓群，其中北柳11号墓出土的护墓木俑，彩绘红、黄色的卷云纹饰。

(七) 分布于高山地带的越族，其葬俗流行崖葬或悬棺葬和船棺葬。崖葬即把死者葬于悬崖峭壁之上，船棺即葬具造成船形。

(八) 自己的语言。越族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和南方辽阔地区，历史绵延数千年。从远古的时候起，它就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有密切的交往，进行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在新石器时代，越族分布地区的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与中原地区的文物惊人的相似。商周朝代，越族逐步参与了中原王朝的政治活动。秦统一越族地区之后，中原地区的劳动人民大量迁来“与越杂处”，形成了一定范围的越族与流族相互杂居的局面，促进了民族的交融。东汉以后，史籍上对越族的称谓及其活动的记载消失了。

西瓯、骆越同源于古越人，是周秦及汉代主要活动于今广西地区的两个不同支系。根据有关文献图籍记载，西瓯的活动地域是五岭以南，南越之西，骆越之东，大体包括双代郁林郡和苍梧郡，相当于柳江以东、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骆越的活动地域则在西瓯之西，汉代牂牁郡东部和东南部，印度支那半岛北部，大体相当于左、右江流域、贵州省西南部及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广东省的茂名及海南岛和广西的陆川、博白，玉林、灵山、合浦一带则是西瓯、骆越的交错杂居地区。

西瓯、骆越与壮族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它们同是壮族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壮族是它们的后裔，可以从文献学、考古学、体质学、人口学，地名学诸方面得到论证。

《壮族通史》是一本全面研究壮族发展史的史学专著，该书以大量的史料史实史迹，通过考证得出了壮族的先民是来自于百越。该书指出：

从汉文古籍上看，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分布的地区，曾经有过瓠、骆(路)、仓吾、损子、产里、句町、濮、夜郎、毋敛等部。又“交趾远在百越之表……其部落十有五焉：曰交趾、越裳氏、武宁、军宁、嘉宁、宁海、陆海、汤泉、新昌、文郎、九真、日南、怀欢、九德……至周庄王时，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雄王（按即雒王之误）”。这十五部落中，有些可能包括壮族祖先。如交趾，先秦古籍《韩非子》、《尚书大传》等都说帝尧之地南至交趾，泛指岭南或长江下游；《尚书·尧曲》称为“南交”：“申命羲叔，宅南交。”故汉武帝所置的十三刺史部之一的交趾部，辖境包括今广东及广西大部。史籍上的这些部，有的可能是氏族，有的可能是部落，有的可能是部落联盟，有的则已经建立邦国，发展程度很不平衡。有的称谓则是地名与氏族部落名合而为一，其中最早出现的是瓠、损子、产里、桂国等。骆名见于周初。句町、夜郎、毋敛为战国时古国名，亦可为建立该国之越人之称谓。壮族部分祖先还可能包括分布于今广东境的南越里人。诸部地望，自东而西，自北而南，依次如下：



图 1-4 越族分布图。

**仓吾** 又作苍梧，《逸周书·王会解》里曾提到“仓吾翡翠”。仓吾地望，“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陵。地总百越，山连五岭”。又云苍梧国“自广东至湘潭”，其境内有苍梧山，“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野”，是为今湖南的九嶷山。《孔子家语·五帝德》也说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综上所述，仓吾人居地东到广东肇庆一带，西迫桂江，南到西江及浔江南岸，北至湘南宁远、道县、江华一带，即古零陵地。《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九嶷山今在湖南省宁远县东南。战国末年，仓吾加盟于瓠。今桂东北角、广东连山、湖南江华尚有壮人，其中当有仓吾部后裔。

**瓠** 又作区、呕、西瓠，是岭南百越中一个古老而强大的部落。大约夏代已名闻中原，故伊尹的四方令里正南第一个提到的便是它。战国末年，瓠人已相当强大，在秦瓠战争中，它竟能在兴安秦城一带神出鬼没，把秦军围困长达3年之久，使秦军陷于“三年不解甲驰弩”，“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的困境，并能击毙秦军统帅尉屠睢，打得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瓠之地望，北接桂国，东与仓吾为邻，西迄桂西、桂西北，南到郁江、邕江、右江一线而与骆越交错。红水河、柳江沿岸为其聚族之地。

**骆** 即骆越，亦称路。它与瓠齐名，亦是岭南一个古老而强大的部落。商代初年，曾贡有“路人大竹”。到了战国时代，“越骆之菌”名闻中原。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汉代，骆越之名史不绝书。考其地望，北与西瓠交错。《旧唐书·地理志》在党州（今玉林县境）、宣化（今南宁市境）、郁平（今玉林县境）诸条下，分别注有“古西瓠所居”、“古骆越池也”、“古西瓠、骆越所居”。从玉林往西经南宁到右江一线，当是骆越与西

瓯的交错线。

**桂国** 《山海经》说，“桂林八树，在番禺之西”。此部因地多产桂树而得名。其地位于桂北，北到湘南，南迫桂江，西至融江一带，东接苍梧部。战国末年，已并入西瓯部。

（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中记述：“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颠，冬夏常青，其类自为林，间无杂树。”《广志》也记：“桂出合浦，而生必于高山之颠，冬夏常青，其类自为林，间无杂树，交趾置桂园。”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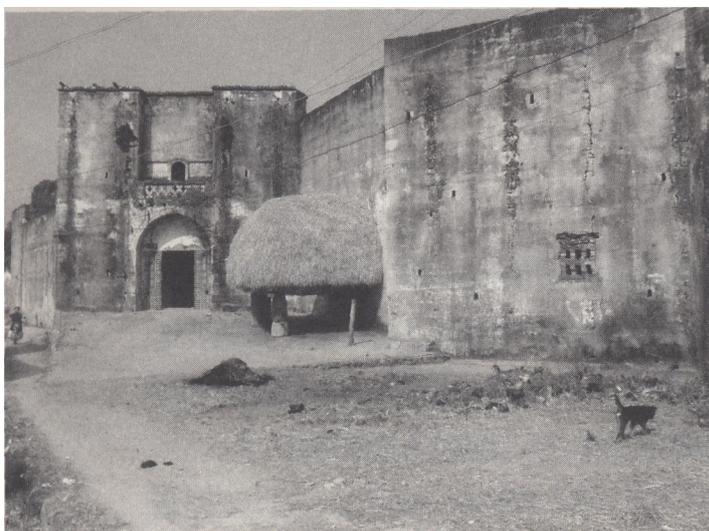


图 1-5 合浦客家土围楼。合浦客家是由中原迁徙而来的，合浦客家民俗民风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中原习俗。

**损子** 《异物志》称：“乌蛮在南海郡之西，安南都统司之北，即乌浒蛮也，古有损子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其国有乌蛮滩，汉建武中，国废。按乌蛮滩在横州东十里。”又云：“乌浒，地名，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又《后汉书·南蛮传》载：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以此可知，损子分布于郁江中游一带，夹在瓯骆之间，人数颇众。居地当在今横县、贵港、容县、玉

林，即今南宁地区东北部，玉林地区及钦州部分地区。其名称因食首子而得。

**产里** 亦称为产国，常与损子并称，即所谓“乌蛮国，乌蛮，古损子产国，即乌浒蛮也”，《天下郡国利病书》亦称“古损子产国”。《太平寰宇记》则云：“三梁故县，乌浒所巢，俗云三梁乌浒即此地也。”可见损子、产里地望相近，部分交错而居，主要在今玉林地区。

**句町** 又作钩町，战国时古国名，立其国者，当为濮越中之句町人，句町部。“至成帝何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队侯俞举兵相攻。”牂牁太守陈立斩兴，诸小邦国尽归议。这是有关句町最后活动的记载。考其地望，“今云南之广南、富州，广西之西隆、西林、凌云、百色诸县即句町县地也”。又《水经注疏》云：“句町在开化、镇昌（今广西德保）之间。”从西林普驮发现的铜鼓墓葬及鎏金铜棺葬看，这一带的青铜文化相当发达。句町所在地区，现在是壮人聚居之地。

岭南瓯骆人与中原华夏人的接触交往以及华夏文化的南传，并为瓯骆人所接受、吸收和融合到本地土著文化之中的另一表现形式是岭南几何印纹陶。在瓯骆故地的广西全州、灌阳、兴安、平乐、富川、钟山、贺州、昭平、苍梧、梧州、岑溪、平南、容县、北流、浦北、合浦、钦州、武鸣等县市，发现了大批的以几何印纹硬陶为特征的古文化遗存，出土的陶器多为胎质细腻、陶质坚硬、火候颇高、纹饰规整的轮制模印硬陶。常见的纹饰有云雷纹、穷曲纹、夔形纹、回形纹、方格纹、米字纹、网纹、席纹、漩涡纹等。其中前五种纹饰是中原地区商周青铜礼器上常见的最流行的花纹装饰。瓯骆地区陶器上的这类纹饰，其基本造型和风格特征与中原商周

青铜器上的同类纹饰基本相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原大地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经济和文化空前发展繁荣和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我国的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开始产生。中原文化也以更加迅猛的态势向四周少数民族地区扩展传播并对封闭落后的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



图 1-6

合浦汉墓出土的铜风灯，被考古科研专家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环保用品。

岭南瓯骆越族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在前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地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岭南的土特产品不断运到中原，中原文化亦以更新更快的态势传入岭南地区。可作佐证的是在瓯骆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都比前期增多，分布地点更为广泛。其青铜器除了零星出土外，还有成批青铜器出自墓葬。1972年在广西恭城县加会秧家村的一处墓葬里，共发现各青铜器31件，包括鼎、尊、钟、岳、剑、戈、钺、镞、斧、兽首柱形器及车马器等。1985年在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清理发掘了89座春秋时期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器形有斧、矛、刮刀、镞、凿、镞、匕首、铃等，并出土了一批铸造钺、斧、镞、镞等青铜器的石范。战国时期的墓葬及其出土的青铜器则更多，在全州、兴

安、灌阳、平乐银山岭、象州罗秀、贺县铺门、柳江白露、宾阳韦坡、武鸣安等秧、田东锅盖岭及德保等地，都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墓葬和青铜器。在出土的青铜器中，除一部分为本地的瓯骆工匠铸造外，大部分是中原地区传人的。

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对百越民族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乌浒、俚、僚均是百越民族中的一部分。乌浒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传》：“灵帝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又载，“光和元年（178年）交趾、合浦乌浒蛮反叛”。郁林郡即秦之桂林郡，汉武帝时更名郁林，其地与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部、西部相当。合浦郡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部与广东省的西南部一带。当时的这一大片地域是西瓯、骆越的分布地区，也是后来壮族聚居的地区。

当时的乌浒人居住在深山之中，巢居鼻饮，射翠取毛，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在海边的乌浒人还以割蚌求珠为业，从事海洋捕捞。亲属观念比较淡薄，无亲戚、重宝货，每遇重大日期，则击铜鼓，歌舞饮酒为乐。《后汉书·南蛮传》载，乌浒人所建的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尚存在着原始的“食人”习俗。

俚，或作“里”，《后汉书·南蛮传》载，公元36年（东汉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自后直至隋唐，俚人之名屡见于南方史籍，并与僚连用，称作“俚僚”。有人认为此乃同一个族属的不同异称，但细究之，两者仍不能完全等同。汉代记载，俚人分布甚广。公元40年（东汉建武十六年）

“交趾女子征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诸俚皆应之”。九真、日南在今越南清化县、广治县一带。合浦，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以及广东省西南部等地。《南史·荀匠传》载，荀匠之兄荀裴于502年（南梁天监元年）为郁林太守时，因“征俚贼”死于阵，可见当时居住于郁林郡的亦均为俚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梁（今广东省阳江市等地）五郡皆有之。”足见俚人的活动地区与乌浒人大致相合。

僚的名称，最早约见于西晋陈寿(233-297)所撰的《益都耆旧传》。《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松之注云：“(诸葛亮)平南事讫，牂牁、举古僚种复反”，同时期的张华《博物志·异俗篇》亦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可见僚的名称在最早记载中大都指牂牁、兴古郡之民族。僚音“lao”，似即古代骆越之骆的同音异写，后世的“佬”与“僚”同音，亦或是“僚”字的转写。汉初在夜郎设牂牁郡，据《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领县十七，范围大约包括今贵州省、云南省曲靖地区东南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红河自治州一部分，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右江上游一带。蜀汉又分为益州、牂牁二郡，连接地设兴古郡，在今云南文山州和红河州一带，当时均有僚人的踪迹。据《晋书·武帝纪》载，公元283年（晋太康四年）六月，牂牁僚二千余落内属，与内地的关系逐渐密切。此后，僚人分布甚广，自长江以南，直达东南亚一带均有所记载。今广东、广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均是僚人的分布地区。僚的名称还常与其居住地名或其他民族名称连用。如岭南僚、邕州僚、南平僚、乌浒（乌武）僚、西原僚、俚僚、侗僚、土僚、山僚、葛僚、夷僚、仡僚、

守宫僚等等。



图 1-7

廉州古城中的“钦州巷”，是钦廉古道的“天涯驿路”，古代交州至广州陆路“交广通道”的必经之路。

各地僚人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僚族还处于巢居溪谷、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而在从汉中到邛、笮、川之间的僚人则散处山谷，居住在依树积木的干栏之上，推一长者为王，父死子继，各自为政，不能远相统摄。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子弟自行吹奏敲打。善于泅水，能在水底持刀刺鱼。武器只有矛与盾，还不会使用弓箭。能织细布，其色泽鲜净。能铸铜为器，大口宽腹，既薄且轻，易于煮熟食物，名曰铜爨。这反映出已具有较高的铸造水平。不仅买卖人口，“亲戚比邻，指授相卖”，“大狗一头，买一生口”，而且俗畏鬼神、杀人祭祀。以所杀者多胡髭为上，剥其面皮，笼于竹上，干燥后称之为“鬼”，鼓舞祭祀，以求福利。公元4世纪30年代（北魏建国—公元338—376）中，僚人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东居的则输缴租赋；而在深山的则不为编户，属于化外。后北魏以梁、益二州不易控制诸僚，乃于514年（北魏延昌三年）设巴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巴中县）加以统摄，并建隆城镇（今四

川省阆中县)，所统辖的僚人达 20 万户，称作北僚，岁输租布，并与外界交通贸易。而巴州的所谓“生僚”则不属官府所管，只在年节之际，由首领到州城谒见巴州刺史。

从百越与壮族的关系论述中，可以看出合浦与损子、桂国、产里、瓠、骆、僚、俚之间的关系，其中尤以合浦乌浒蛮在当时颇具实力。

在许多记述百越史实史迹的古籍中，对当时合浦区域的记述都有非常明确的描述。特别是对当时合浦区域的特产都有专题转述。唐杜佑的《通典》一书，《古南越》篇中，详列了百越之地的历代沿革：

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或云南越之君，亦夏禹之后。按瓠越、闽越，禹后少康之庶子所封之地。即南越，非其种也，故《舆地志》云，东南有二越，其义详矣。或曰自交趾至于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故不得尽云少康之后），古谓之雕题（谓雕题刻其额也）。

《礼记·王制》曰：“南方曰雕题。”非禹九州之域，又非《周礼·职方》之限（《晋书》、《隋书》并谓交、广之地，为《禹贡》扬州之域。今稽其封略，考其镇藪，则《禹贡》、《职方》皆不及此，故列于九州之外）。在天文，牵牛、婺女则越之分野（得汉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其分也。今南海、义宁、海丰、恩平、蒙山、正平、开江、连城、郁林、平琴、安城、贺水、常林、象郡、龙城、融水、朗宁、南潘、怀泽、宁仁、新兴、新宁、陵水、南昌、宁越、定川、宁浦、横山、修德、龙池、安南、武峨、龙水、忻城、九真、福禄、文阳、日南、承化、铜陵、永定、玉山、合浦、安乐、海康、苍梧、怀德、临潭、乐古、温水、汤泉

等郡是也)，兼得楚之交（汉零陵、桂阳，今始安之北境及始兴，皆宜属楚）。秦始皇略定扬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塞上岭一也，今南安郡大庾岭是。骑田岭二也。今桂阳郡腊岭是。都庞岭三也，今江华郡永明岭是。渚岭四也，亦江华界白芒岭是。越城岭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临源岭是。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也）。后遣任嚣攻取陆梁之地，遂平南越，置郡，此为南海（今南海、始兴、义宁、海丰、恩平、南陵、临贺、高要、感义、晋康、临封、开阳、高凉、连城、新兴、铜陵、怀德等郡县）、桂林（今始安、平乐、蒙山、开江、浔江、苍梧、临江、郁林、平琴、安城、贺永、常林、象郡、龙城、融水、郎宁、怀泽、宁浦、横山、德、龙池、永定等郡是）、象（今招义、南潘、普宁、陵水、南昌、定川、宁越、安南、武峨、龙水、忻城、九真、福禄、文阳、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乐、海康、温水、汤泉等郡是），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者也（任嚣病且死，召赵佗谓曰：“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可以为国。”遂以赵佗为南海尉）。秦末，赵佗遂王其地，汉因封之。佗后数代，其相吕嘉反叛，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讨平之（分秦南海、桂林、象郡，置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并旧九郡是）。元封初，又遣军自合浦徐闻入南海，至大洲，方千里，略得之（置儋耳、珠崖二郡。至元帝时，以其数反，罢弃之）。后兼置交趾刺史（领七郡）。其余土宇，自汉以后，历代开拓（今临潭、扶南、正平、乐古、珠崖、昌化、延德、琼山、万安等郡是）。

后汉建武中，交趾女子徵侧、妹徵贰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俚皆应之，自立为交趾帝。使马援平定交部，始调立城郭，置井邑。至献帝，

乃立为交州（领郡七。时张津为交趾刺史，士燮为交趾太守，共上表请立为州，置牧。初理龙编县，即今安南府是也。乃置交州牧，徙理苍梧文信县，即今郡苍梧县也。建安十六年，又徙理南海番禺县，即今郡县也，寻又移理龙编）。其边州，诏使持节，给鼓吹，以重威镇，加九锡、六佾之舞。汉末，其地并属吴，仍分为广州（领郡三，理番禺）。后蜀以建宁太守遥领交州。晋平蜀，亦然。及平吴，仍旧交、广二州（并因前代，交领郡七，广领郡六）。宋分为广州（领郡十七，理番禺）、交州（领郡五，理龙编）、越州（领郡三，理临漳，今合浦郡）。齐并因之（广州领郡二十三，交州领郡九，越州领郡二十）。梁、陈以来，废置混杂，不能悉举。唐分十五部，此为岭南道。五代时，为刘氏所据。宋乾德四年，平南汉，始尽得岭南之地，分为广南东路、西路。

以上考证为合浦在古越时代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铺垫。由此，也提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上对外贸易航线为什么要以合浦为始发港，合浦以什么条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以百越民族及百越区域内最具象征性的考古遗存为例，可以看出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有当时的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缘由。

瓯骆故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壮族古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内壮族先民在与大自然进行长期艰苦斗争，不断开拓进取的智慧结晶及反映了壮族古代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遗存。新石器时代遗址保存了大量的实物，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形态、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社会形态乃至文化面貌及年代的重要见证。根据考古科研部门统计，合浦郡境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共有 47 处，遗址出土文物与今壮族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

的出土的文物相一致。其最具象征性的文物包括大石铲、有段石铤、有肩石斧、石钺、几何印纹陶干栏建筑、稻作农业等。合浦郡境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面广点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发现很多，几乎遍布环北部湾地区（即古合浦郡地域内）。其中邕宁 8 处、防城 9 处、钦州 4 处、北海 1 处、合浦 2 处、浦北 7 处、灵山 7 处、横县 8 处、容县 1 处。实地现存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远不止这个数，因为各县市的现有统计数字均大大超出此数，以浦北为例，浦北发现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山冈遗址 18 处，比统计的 7 处多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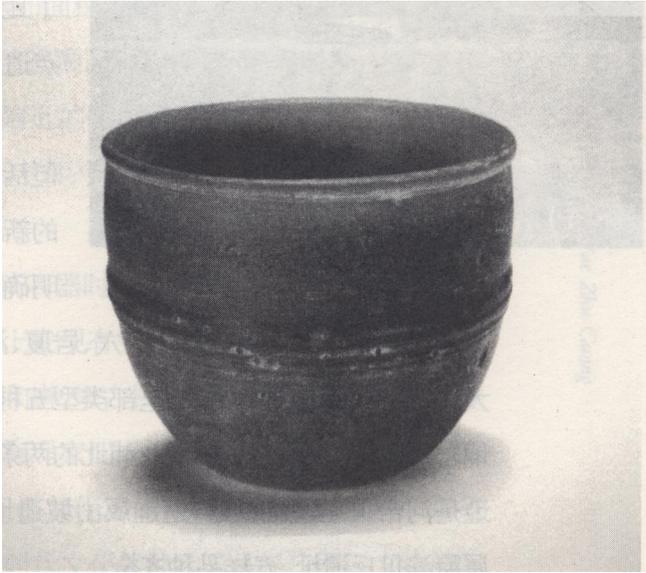


图 1-8

合浦汉墓出土的琉璃杯，是汉代海上中外贸易的舶来品，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主要进口商品之一。

在统计数字内的合浦郡境上述数十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较为著名的有西沙坡、牛屎环塘、顶狮山、杯较山、亚菩山、钟秀山、犀牛脚、马兰咀、芭蕉墩、亚陆江、杨义岭、西津、秋江、江口、大寺和那丽独料等处。

合浦郡境地内有齐全的新石器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在今广西境内的有：在犀牛脚镇发现了距今 8000 年至 1 万年的贝丘遗址；顶狮山文化延续的时间大约为距今 9000—7000 年；合浦县牛屎环塘遗址、防城港市亚菩山、马兰咀和杯较山遗址、钦州市芭蕉墩和亚陆江杨义岭遗址等，约距今 9000—6000 年前；石塘镇钟秀山发现距今 5000—6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那丽镇和大寺镇，发现了距今 4000—5000 年的原始居民点遗址。



图 1-9

南流江入海河段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连接中原的主要通道，河段面边古城老街的私家货运码头，见证了当年水运商贸的繁荣。

合浦郡境地区的远古人类不但活动频繁，繁衍持续，而且留传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品种齐全，分期明确，遗物丰富。据史学家统计，北部湾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分为洞穴、岩厦、河傍台地、山坡、海滨遗址等几大类，合浦郡境拥有完整的全部类型五种文化遗址。其中的东胜岩、匍地岩和洪窟

洞等是洞穴遗址；浦北的两条河畔处有岩厦遗址；顶狮山遗址是河帝贝丘遗址；独料遗址属山坡遗址；亚菩山遗址、马兰咀山遗址属海滨贝丘遗址，五样品种齐全。

合浦郡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不但从1万年前到4000年前的时期遗址均有，而且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分期遗存明确又有特色。其早期文化遗存是以顶狮山遗址一期文化、杯较山和亚菩山贝丘遗址为代表，而早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以打制石器为主，但已出现了磨制石器和夹砂绳纹陶；其中期文化遗存是以顶狮山二、三期文化，横县江口遗址为代表，中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以磨制石器为主，仍有不少打制石器；其晚期文化遗存是以钦州独料遗址为代表，晚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是磨制石器已占大多数。

合浦郡境的北海“西沙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合浦郡境目前所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遗址，遗物散布面积达9万平方米，采集的遗物有磨制的肩石斧、石镞、石刀及夹砂红褐陶。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已有古人类的活动踪迹。合浦县城附近的牛屎环塘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年代较早，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约距今9000—6000年前，出土有石器、骨器、蚌器、陶器和动物遗骸等。

合浦境的北海的“高高墩”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59年文物普查，在白虎头名为“高高墩”的沙丘上发现有夹砂陶和方格陶片。此外还有暗纹瓷，高脚瓷碗等宋、元瓷片和唐、宋古钱，说明北海辖境并非晚近才有居民。由此证实了位于今北海冯家江入海口附近的这个“高高墩”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处于极其优势的地域位置上，这是广东省1959年文物普查确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又是经广西区文物部门认可并列入广西

178 处新石器文化遗址行列的文化遗址。

合浦郡境内的防城亚善山、马兰咀和杯较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有石器、骨器、蚌器、陶器和动物遗骸等。石器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种，还有砍砸器、三角形石器、两用石器、石球、网坠等。磨制石器有斧、斨、凿、磨盘、杵、石饼、砺石等，其中以斧、斨为最多，斧、斨还有一部分是有肩的，具有浓烈的地方特色。骨器有骨锥，骨镞，穿孔骨饼等，蚌器有蚌铲、蚶壳网附和蚌环等。蚌环是珍珠饰物，属于珍珠的副产品，可以想象古合浦人很古以前即发现和重视珍珠和珍珠副产品的饰物作用了。陶片全是夹砂陶，纹饰以绳纹为主，也有篮纹、划纹的。防城杯较山出土的陶片胎质有的为红色，有的为灰黑色。这些遗址出土的动物种类除了贝壳外，还有鹿、象、兔、鱼、龟、鸟等。

合浦郡境属的芭蕉墩遗址位于今钦州市犀牛脚丹寮村西金鼓江的一个土墩上。大海涨潮时该墩成了一个孤岛，退潮后四周是滩涂。墩上有厚厚一层牡蛎、蚌壳的堆积层，遗址中的遗物以打制石器为主，器形以蚌为多见。芭蕉墩文化遗址是一处以渔猎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海滨贝丘遗址。



图 1-10

合浦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位于县城东郊的清水江新石器文化遗址所在地。

在合浦郡境中发现的距今 4000—5000 年的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钦州

市那丽镇独料村大石铲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最丰富，出土的石器共有 1100 余件。

在合浦郡境地区范围内发现的数十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完整分据各千年，早、中、晚期特色分明，样样俱全，兼之五个品种齐全，证明了古合浦郡地区尤其是合浦郡港口群地带从旧石器时代起一直是人类活动的活跃区域和持续区域。

合浦郡境拥有大石铲与青铜器残片共存的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些从石器时代转化到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人类活动活跃和持续发展的明证。

先秦时期，是指从新石器时代结束开始一直到秦朝统一岭南止的历史阶段，越人地区的前秦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五个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称作青铜器时期，是因为此时的生产力飞速发展的重要标志是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及逐步成熟起来，在金属冶炼的初始是青铜的冶炼技术首开先河，而青铜器又是最早出现的金属制品，故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接的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时开始的新的时代就称作青铜器时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继续发展，古合浦所在的桂南及桂东南地区及整个南越国区域内就先后进入了青铜器时代。

印纹硬陶是一种火候、硬度、质地、纹饰、制作工艺水平都不同于绳纹陶器，其出现的年代亦比绳纹陶器晚，通常是与青铜文化共存的一种很有特征的文化遗物，年代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在古合浦地区的北海、合浦、浦北、钦州、北流、容县以及古属桂林郡的梧州一带都出土有印纹硬陶陶器或残片。这些代表青铜器时期的陶器的纹样很多，计有篮纹、回

纹、米字纹、雷纹、羽状纹、回字羽状纹、编织纹、菱形纹等。



图 1-11

合浦汉墓出土的铜母马，在岭南罕见。



图 1-12

合浦汉墓出土的青铜实心牛。

青铜时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继续发展的阶段延伸，而合浦郡境地区的青铜时代郡境的居民也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繁衍而来的土著民族，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越民族之一。合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青铜时代的最明显的文化遗址是大石铲与青铜器共存的清水江新石器时代遗址。合浦县清水江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发现大石铲与青铜器残片共存的情况。这一明显的进化阶段文化遗存以出土文物证实古合浦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转入下一个时代的繁华情况。

合浦郡境出土的先秦时期青铜器出土文物年代最早的大约是商代晚期，这批零星的青铜器大多是经农民之手于土中掘得，出土的先秦青铜器或印纹硬陶在今合浦、浦北、钦州、陆川、容县、北流、横县等地均有。

合浦郡境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中，在容县、浦北等古属合浦境郡地出土的羊角钮铜钟颇有特色。羊角钮铜钟形状像半截橄榄，上小下大，中空、底平直，顶部有竖方形透穿孔，顶端有两片羊角形钮。浦北官垌大岭脚出土的四件下部都有一周菱形雷纹，容县六王龙井坳出土的四件略显修长，面部饰“S”形云纹，下端饰密集的弦纹。

古越人的物质文化有自己的特点，瓯越人民剪发文身，错臂左衽，与华夏人的上体短衣、交领右衽不同。而岭南越人则穿筒裙，项髻徒跣，着贯头衣，在服饰上富有自己的特色。古越人“饭稻羹鱼”，除熟食外，还喜食生鱼肉。据对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发现百越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可能利用竹、木材建造大批带榫卯的干栏建筑，此外胡州市钱山漾，杭州市水田畈，江西省清江县营盘里，广东省高安县茅岗，福建省崇安县汉城高胡坪等遗址都有发现。按干栏又称“麻栏”、“高栏”、“葛栏”，

它以木柱构成底架，房屋建于悬空之上，离开地面，屋顶作两面坡式，正脊的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和堆置农具杂物。西南僚人亦“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现代壮、布依、傣、侗、水等族地区亦多干栏式建筑）。干栏还有高干栏与低干栏之分，高者底间较高，可容纳家畜及置放杂物；低者距地面较近，一般仅用于防潮之用。干栏式建筑是百越人民根据自然、地理、气候、特产所创造的富有民族风格和特点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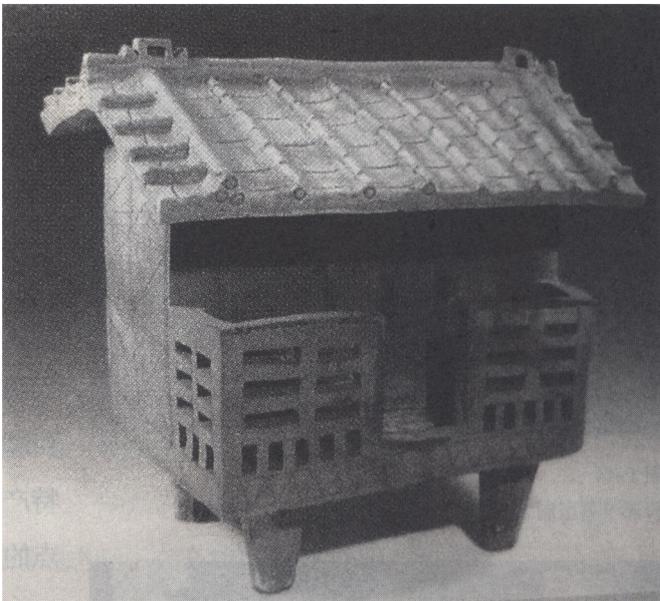


图 1-13

合浦汉墓中出土的陶干栏陶屋，是古越建筑标志“干栏”的见证。

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干栏式铁屋和陶屋。

铜鼓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用青铜铸造的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打击乐器和礼器，它约产生于公元前一千年中叶。广西是中国古代铸造和使用铜鼓的主要地区之一，从桂南到桂北，从桂东到桂西，不断有铜鼓出土。广西如今仍有一些少数民族珍藏和使用铜鼓。壮族、瑶族等都是使用

和制造鼓的民族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广西目前有馆藏铜鼓 600 多面，民间所藏和使用的铜鼓就更加丰富，仅东兰县就有近 500 面。在北流市出土的一面铜鼓，面径达 156 厘米，高 67.5 厘米，重达 300 公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铜鼓，被誉为“铜鼓之王”。广西出土的铜鼓数量之多，居我国乃至世界之首位。广西博物馆收藏古代铜鼓 300 余面，是目前世界上收藏铜鼓最多的一个博物馆，曾举办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铜鼓展览。历史上铜鼓用于祭把、战阵、集会、贮藏财货、随葬、娱乐等。约在明朝以后，铜鼓逐渐成为壮族等广西少数民族的一般娱乐乐器，凡婚嫁、宴请、斗牛、节日等都击鼓为乐。



图 1-14

合浦汉墓型制之一。



图 1-15

合浦汉墓型制之夫妻双人墓。

合浦是铜鼓的最初生产制造地之一，在合浦有铜鼓的遗址及铜鼓生产的记载。

歌圩，壮语叫“龙洞”，也叫歌坡或坡会，是壮族群众以山歌为形式的社交聚会活动；也是青年男女最喜爱的活动之一。歌圩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歌圩的内容多以山歌为主，其形式一般有男女个人对唱和男女群体对唱两种。山歌有见面歌、邀请歌、盘歌、新歌、爱慕歌、盟誓歌、送别歌等。壮族青年能歌善唱者众，出口成歌。优秀的歌手，其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对唱如流，歌声甜润而响亮，悦耳动听。对山歌有一定的规则，在野外对歌，可以唱缠缠绵绵、催断肝肠的情歌，不唱深交歌，开始时首先对歌传情以外，也可以抛绣球、碰蛋定情。当今的壮族歌圩已发生较大的变化，只有少数地区不盛行这种传统的壮族歌圩，如天等、靖西、武鸣、宁明、龙州等县。

合浦歌圩一直延续到清代，由于合浦的歌圩婚把安南女子都引了过来，曾一度被清政府禁令取消。

从古越地广泛发现栽培稻的多处遗存表明，古越族的先民是稻作的发明者之一，百越民族的稻作农业，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两广、台湾等省发现的十多处含有炭化稻谷或稻壳遗存中，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水稻谷壳等堆积遗存厚40—50厘米。经鉴定，它们是具有典型籼稻征状的人工栽培稻，古越人除种稻以外，还种植菜、黍、赤豆、粟、麦、大豆、蔬菜、水果等作物。进行犁耕，并有了多种农具，一部分地区采用“火耕水耨”的方式栽培水稻，还饲养水牛、猪、狗、羊、鸡、鸭、自行纺织丝、麻织物，有着自己

的玉石器制造，青铜冶铸，陶瓷烧制，竹木器编造等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古越人的制舟技术较高，造船业比较发达，吴王使用的大舟“余皇”，广5.3米，长4米，可容战士、水手等80余人。广州秦汉时期造船工场遗址，可同时建造载重50—60吨的木船数艘，船台采用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规模巨大，反映出当时具有较高的造船工艺。



图 1-16

合浦汉墓出土的青铜龙钮墓镇，在全国属罕见。

合浦汉墓中出土有陶猪栏、陶猪群、丝、水稻、荔枝等文物。

百越人善于架舟用船。属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间的台湾园山文化，就是由祖国东南大陆渡海而去的。早在周成王时，就有“于越献舟”的记载。

合浦郡境内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造船厂遗址和汉代造船厂遗址。

古越人有着自己的图腾信仰，文身习俗，就是在身上刻画以后，实墨其中，“烂然成章”，“以入水，蛟龙不害也”，原因显与“闽州越地，即古东瓯”，“皆蛇种”有关（说明当时越人信奉龙蛇图腾，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习俗产生)。除此以外，在今浙江省余姚县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次发现鸟形雕塑和图案，在先秦的越人中还流行鸟田传说以及越王“鸟喙”，越人“鸟语”、“鸟书”的记载，说明越人从器皿、经济生产直到上层建筑，均渗透着鸟的观念，这是越人崇信鸟图腾的反映。现代黎、侗、水、布依等民族尚行鸡卜之俗，亦即古代越人鸟图腾崇拜的遗留。



图 1-17

位于合浦县城与乾体古港口之间的九头庙战国造船厂遗址。

合浦郡境地也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图腾崇拜。大量存在的石狗见证了古越民族的起源于帝颛、项高阳的传说。

吴越故地是春秋时代青铜宝剑的故乡。干将和莫邪的故事流传甚广，浙江莫干山即由此得名，并有剑池遗址。因越人擅长铸造和使用青铜剑，在古越族居地每每发现有青铜剑遗存。1965年在湖北出土一把越王勾践的宝剑；1973年在湖北江陵又出土一把赵王州句剑。

合浦郡境盛产铜，有铜山县的设置，合浦的青铜冶炼技术成熟，不但是铜鼓的最初出产地，还是青铜剑的流通集散地，合浦汉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剑就是见证。

百越族的许多支系都有所谓的“断发文身”，喜食虫蛇蚌蛤腥味之物等

习俗。他们认为剪了发，便于下水，而文身像蛟龙的形象，可以避免水中动物的伤害。



图 1-18

合浦汉墓出土的青铜剑。

合浦郡境地至今仍保留着这些饮食习惯，许多古籍的记述中不乏这方面的文字。

壮族的师公戏源于雉祭古俗。乡人俗称“唱师”、“跳师”。师公是当地民间祭礼的主持者，在祭祀活动进行时，以演唱或舞蹈伴之，使祭祀活动娱神、娱人，因而深受群众喜爱。清代诗人梁廉大曾描述过重阳日乡人看“跳师”的愉悦场面：“仍遥闻瓦鼓响坛、知是良辰九九期；三五成群携手注，都言大社看跳师。放下腰镰力未疲。喜邀同伴看跳师，归来羌豆休忘买，留待明朝逐疫时。”诗中的注曰：“重九日街墟尾大社每装假相（面具）跳舞唱歌，谓之跳师，人多注看，次早则沿门颁符，古乡滩之俗存也。”后一首的注是：“乡俗每值秋季扮万相唱歌谓之跳师，次日沿门逐疫，家家以黄豆、丝祀祖，盖犹存滩之古俗云。”壮族的师公戏是古越民俗艺术的伸延。

合浦山歌舞中的“老杨公”，其表演形式和表演内容与壮族的师公戏基本相同。

陶器的发明与发展，是农业民族的重要历史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器适应了农作物熟食和农业民族的定居生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丰富多彩的陶器，如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而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特色的是几何印纹陶，其兴盛时间距今3500—2200年间，即商周至汉初，陶器上各种几何形图案花纹达五六十种之多。经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几何印纹陶与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镞共存，分布范围自长江下游至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正与古越族及其先人的活动地区相吻合，可以说几何印纹陶正是古越族及其先人创造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与原始釉陶和原始青瓷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合浦郡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几何印纹，大石铲原始来由陶等，与百越地区的考古物证相一致。



图 1-19

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的多样性，见证了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商贸之繁荣。

秦汉以来的古籍中，记载有大量的百越民族对珍珠开采使用的情景。“越俗以珠为宝”（《述异志》），百越的珍珠开发史在中国古代史上留有浓墨重彩的华章。而百越的珍珠发展史就是以合浦为中心的。后世的史料典籍中有许多记录。

《逸周书·王会解》载：“正南瓠、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里的“珠玕”，泛指珍珠，主要来自环北部湾沿岸地区。

自秦汉以后，历代皇帝均派遣朝廷官员到合浦一带监守珠池，开采珍珠，进贡宫廷。东汉时合浦郡珍珠业逐渐兴盛，据《汉书·孟尝传》记载，当地合浦郡地方官为了向民间搜刮珍珠，强迫珠民连年滥采，珍珠资源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故有“珠遂徙于交趾郡界”之说。汉顺帝时，孟尝任合浦郡太守，改革前弊，对合浦珍珠资源采取了保护措施，合浦珍珠得到了繁衍，所以有“合浦珠还”的传说。宁龄先在《合浦还珠状》中说：“合浦县内珠池，天宝年以来，官吏无政，珠逃不见，二十年间阙于进奉；今年二月十五日，珠还旧浦。”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载：“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赋。”唐代廉州，即今合浦县、浦北县一带，包括今北海市。《新唐书·地理志》载：“崖州朱崖郡下，土贡：金、银、珠、玳瑁、高良姜。”如《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五》载：“太平兴国二年贡珠百斤。七年贡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场所采。”南宋时期，统治者忙于与元朝军队的战争，无暇顾及采珠，进贡珍珠也停止了。《宋史·高宗纪》有：“罢廉州贡珠，纵蛋丁自便”的文献记录。

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四引西汉杨孚《异物志》载：“乌浒，南蛮之别名……射翠取毛，割蚌求珠为业。”翠鸟之毛和蚌之珠，都必须通过商业交易换取粮食，才能使其成为维持乌浒人生活的重要来源。《汉书·地理志》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玕、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盐铁论·力耕》第二载：“珠玕、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一揖而中万锺之粟也。”“锺”是秦汉时候的量器名，合六十四斗。“一揖而中万锺之粟也”说明环北部湾沿岸出产的珍珠价值十分珍贵，一捧值粟万锺。《汉书·王章传》载：“成帝时，王章死，妻子皆徙合浦。王商辅曰：‘还章妻，子故乡，其家属皆采珠，致产数百万’。”《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尝（孟尝——编者注）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常通商贩，贸粮食。”《晋书·陶璜传》载：“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

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皇帝下诏采珠20多次。据《明史·食货志》的统计，弘治十二年（1499年）一役获珠最多，计二万八千两，花费了一万多两银子，这也是合浦地区历史上进贡珍珠的最高数量是当时对珍珠滥采的记录。南朝梁任防《述异记》云：“越俗以珠为宝，合浦有珠市。”珠市即珍珠买卖交易的场所。唐朝时候，也允许珍珠的自由买卖，项斯在《蛮家诗》中就有“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的说法。

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宝货门》中载：“合浦产珠之地，名曰断望池……昼家不善为价，冒死得之，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既入其手，即分为品等珠两而卖入城中。又经数手乃至都下，其价递相倍蓰，

至于不贲。”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云：廉州“珠市西头近接城，客餐珠肉当琼英。廉州个个珠媚娘，只为珠池水色清”。“盗珠之人一，而买珠之人千百。产珠之池一隅，而用珠之国极于东西南朔。富者以多珠为荣，贫者以无珠为耻。至有金子不如珠子之语。此风俗之所以日偷也。”合浦珠池在历史上形成的产业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图 1-20

合浦珍珠。

宋朝李石《续博物志》卷十引南朝时候沈怀远《南越志》载：“将珠分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九分为大品。有光彩一边小平似覆釜者名瑇珠，瑇珠之次为走珠，走珠之次为滑珠，滑珠之次为磊螺珠，磊螺珠之次为官雨珠，官雨珠之次为税珠，税珠之次为葱珠。”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对珍珠品级的划分也比较具体。《天工开物·珠玉》载：“凡中国珠必产雷、廉二池。……自五分至一寸五分者为大品。小平似覆釜，一边光彩微似镀金者，此名瑇珠，其值一颗千金矣。古来‘明月’、‘夜光’，即此便是。白昼晴明，檐下看有光一线闪烁不定，‘夜光’乃其美号，非真有昏夜放光之珠也。次则走珠，置平底盘中，圆转无定歇，价亦与瑇珠相仿，化

者之身受含一粒则不复朽坏，故帝王之家重价购此。次则滑珠，色光而形不甚圆。次则螺蚶珠，次官雨珠，次税珠，次葱符珠。幼珠如梁粟，常珠如豌豆。稗而碎者曰玢。自夜光于碎玢，譬均一人身而王公至于氓隶也。”

到了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五中说：“珠身以圆白莹细无丝络者为精珠，半明半暗者为褪光珠，次肉珠，次糙珠、药珠。大而稍扁者曰瑄珠，所谓南海之明瑄也。其曰走珠、滑珠、螺蚶珠、官雨珠、税珠、葱符珠、稗珠，古有此名，今莫能辨。但以精珠龙睛粉白，重一分者银六倒，二分者四十倒，肉珠二分重者四倒，合八百颗而成一两者曰八百子，则十倒；合千颗而成一两者曰正干，八倒。其重七分者为珍，八分者为宝，故曰七珍八宝，其价则莫可定云。”一般来说，评价珍珠的标准，以“光、重、圆、大”四字为标准。光泽是越亮越好，有半透明感为上，珠身越老，白光度越大，称为“有晶”，有晶之珠价格最贵。世称“夜光珠”即属此类。珠质越重越好，质松而轻者为次，中空易碎者为下，珠形越圆的越珍贵。有精圆，又称走盘珠；本庄圆，又称饱样；椭圆，又称枣样。其次有梨形珠、蛋形珠、泪形珠、扣形珠、次级珠、半珠、六分珠、子珠、尘珠、半形珠等。其中以走盘珠最为珍贵，价格最高，适合做首饰。珠颗大小以直径长短而言，古以“径寸明珠”为无价之珍。其重量与直径有关，重者大，轻者小。

清人李调元在《粤西杂录》中说：“南珠出合浦白龙，历为贡品”是有道理的。

有了合浦的珍珠，使“越俗以珠为宝”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形态引起了历朝历代中央政权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开发。于是便有商汤四方令中的以“珠

玃为献”；秦始皇因“玃珠、犀角之利”而开通的南取百越“运粮水道”；汉武帝平定南越，设郡立珠市，拓展海上丝绸之路，把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纳入官府管理，形成了一条以合浦始发港为中心呈“丫”状向三个方向辐射伸展的，向东沿海伸展至山东、日本、朝鲜；向西沿海伸展至东南亚、印度洋诸国；向北沿南流江联通漓江、珠江、湘江水运网络入中原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稳定发展了两千多年，开辟了中国海上交通及对外贸易的新纪元。